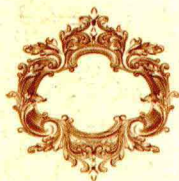


· 上海政法学院学术文库 ·



从“保障安全”到“提升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澳大利亚对美国追随政策之分析

岳小颖 ·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从“保障安全”到“提升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澳大利亚对美国追随政策之分析

岳小颖·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保障安全”到“提升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澳大利亚对美国追随政策之分析/岳小颖著.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

ISBN 978 - 7 - 5520 - 0250 - 8

I. ①从… II. ①岳… III. ①外交政策—研究—澳大利
亚—现代 IV. ①D861.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61530 号

从“保障安全”到“提升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澳大利亚对美国追随政策之分析

作 者：岳小颖

责任编辑：张晓栋

封面设计：闵 敏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信老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开

印 张：14.5

插 页：2

字 数：260 千字

版 次：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520 - 0250 - 8/D · 242

定价：4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导论	1
一、缘起与研究意义	1
二、国内外的研究的状况	2
三、研究理论与方法	11
四、论文的基本观点和创新之处	17
五、基本架构	18
第一章 澳美同盟：历史与理论	20
第一节 澳美同盟的过去与现在	20
一、澳英传统关系的松动与弱化	20
二、“强而有力”朋友的出现	23
三、澳美同盟的建立与发展	27
四、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同盟的裂变与澳大利亚的政策调整	37
五、澳美同盟的深化	40
第二节 同盟理论综述与分析框架的提出	47
一、同盟理论及其基本流派	48
二、理论分析框架的提出	63
第二章 朝鲜战争	77
第一节 “保障安全”目标的确立	77
一、应对共产主义威胁？	78
二、“激进派”与“谨慎派”的争论	79
第二节 战场上的行动：实施“保险政策”	86

一、关于增兵问题的讨论	86
二、积极行动以获得认可	95
第三节 获益与代价	97
一、同盟关系的建立与军事合作的加深	98
二、不确定的承诺与不对称的关系	102
第三章 越南战争：对美政策的困境	106
第一节 参战以保障安全	106
一、澳大利亚对越南问题态度的转变	106
二、澳大利亚与印尼的冲突——出兵的实质性原因	108
第二节 战场上的行动：巩固同盟关系	116
一、“审慎”还是“主动”？	116
二、取悦美国的努力	121
第三节 对美政策的困境、反思与调整	127
一、“保险政策”的困境	127
二、对美政策的反思与调整	130
三、冷战结束前澳大利亚对美追随政策的特点	133
第四章 冷战后澳大利亚的国防安全政策及其调整	135
第一节 冷战后澳大利亚的国防安全政策	135
一、国际与地区形势的变化	135
二、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调整	137
三、澳大利亚国家安全政策的内容	142
第二节 “9·11”后澳大利亚国防安全政策的调整	146
一、“9·11”后的国际和地区形势	147
二、小布什政府的亚太安全战略	149
三、“9·11”后霍华德政府国家安全政策的调整	156

第五章 澳大利亚的伊拉克战争	160
第一节 参战以提升地位	160
一、出兵的表面原因：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160
二、“借势政策”的内容	165
第二节 战场上的行动：实施“借势政策”	170
一、有限的参战	170
二、速战速决的行动	172
三、战争的伤亡	175
第三节 地位的提升及局限	176
一、澳美同盟强化与澳大利亚地位的提升	176
二、伊战对澳大利亚与亚洲国家关系的影响	180
第六章 澳美同盟与亚太安全	183
第一节 新时期澳美安全政策的变化	183
一、亚太地区形势的新动向	183
二、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安全战略与同盟政策	185
三、新国防白皮书的发布与澳大利亚的国防安全政策	192
四、政策调整的局限性及其对亚太安全的影响	197
第二节 澳美同盟与中国	199
一、澳美同盟政策中的“中国”	199
二、对“追随政策”的评价	203
结论	207
参考文献	217
一、主要英文著作	217
二、中文著作	222

导 论

一、缘起与研究意义

澳大利亚是后起的发达国家,国土面积有 768 万多平方公里,居世界第六位。澳大利亚是大洋洲的主体,南半球的大国。同时它还是连接太平洋与印度洋的桥梁,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美国亚洲太平洋政策中,它是美国西太平洋安全的“南锚”,也是由南向北包抄东南亚乃至整个东亚的“桥头堡”。在历史上,澳大利亚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又是英联邦成员,其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也源于英国。因此,尽管美澳历史命运各异,但两国相同的殖民地经历,以及在血缘与文化上的共同性,使美澳同盟关系在环太平洋美国同盟体系中,呈现出更多的相互认同与信任。

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存在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美国的军事同盟,这些军事同盟与美国在欧洲的军事联盟不同,多为双边,且分布地域比较广,相对稳定。这些同盟的存在涵盖了亚太所有军事战略要地和热点地区。从 20 世纪 50 年代成形,经历了从冷战至冷战后两个跨世纪的历史阶段,至今仍是美国对外军事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笔者的有限研究,感觉到在中国学者的研究中,美日、美韩同盟关系一直是研究的热点,往往忽视对澳美同盟关系的研究,对澳美同盟的研究空白点比较多。但我们认为,实际上,美澳同盟是一个重要的分析变量。作为美国构建西太平洋安全网络体系的重要一环,美澳同盟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利益具有重要影响,是实现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澳大利亚既不同于韩国,也不同于日本。这个地处南太平洋一隅的岛国与美国有相似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同为盎格鲁—撒克逊人后裔。与日韩相比,其与美国的摩擦相对较少。从与美国建立同盟关系至今的半个世纪中,澳大利亚参加了美国在亚洲的历次军事干涉。

本书的研究目的是通过对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2003 年)的考察,在深厚的历史土壤中发掘澳大利亚参战的决策和战争中的表现,对澳大利亚对美政策的特点作出分析和归纳。

具体地说,选择澳大利亚的对美政策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有以下几点意义。

首先,现有国内关于亚太国际关系的研究更加偏重于美日、美韩同盟的研究,但是对于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南锚”——澳大利亚对美政策特点及其演变缺乏系统和实证性的研究。厘清其发展演变的过程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国盟国的政策,同时有助于理解整个国际关系和美国同盟体系对亚太地区的影响。

其次,美澳两国实力明显不对等,其中美国是世界大国,而澳大利亚是地区性国家,这种差异决定它们在对外战略基点方面的不同以及在协调政策方面的复杂性。澳大利亚外交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地区安全机制,寻求一个强大盟国来保证其国家安全;美国关注的则是全球及亚洲的“共产主义威胁”。这使美国和澳大利亚对同盟关系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大国和地区国家在实现战略目标与维系盟国关系之间的选择和协调问题,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值得我们关注。

再次,澳大利亚这个被大多数人认为是世界上外部环境最为安全的国家,同时也是对美国的追随最为紧密的国家。尽管澳大利亚与美国的密切关系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等不同的领域,但是澳美关系的基础仍然是澳美同盟关系,其特性也是最鲜明地体现在军事领域。通过三次战争为案例研究澳大利亚对美政策有助于更好地把握澳美同盟的特点和走向。

第四,冷战结束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澳同盟不仅没有像人们所想的那样逐步弱化,反而出现了不断巩固和强化的趋势,并继续成为影响西南太平洋地区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美国着眼于21世纪的全球战略调整中,澳大利亚是其在太平洋地区的主要战略支点之一。美澳同盟到底向何处去,它在未来的亚太安全格局中究竟要扮演什么角色,更是引起人们的关注。因此,对美澳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最后,随着当前中澳关系的日益密切、和谐和发展,了解美国盟友澳大利亚的对美政策对中国无疑也具有明显的政策意义。

二、国内外的研究的状况

本书资料的收集主要来自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数据库,如Jstor, Blackwell, Ebsco等,以及google学术搜索中的互联网资源。此外,本人有机会赴澳收集相关资料,包括来自于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孟席斯(Menzies)图书馆、切夫利(Chifley)图书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防与战略研究中心(Strategic and Defence Studies Centre)的资料室、墨尔本大学图书馆和维多利亚州立图书馆的档案、文献、回忆录、期刊等资料。

(一) 中国方面的研究状况

在国内近年来进行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对澳大利亚问题的关注不断增多,这为我国今后的澳大利亚问题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目前,国内研究澳大利亚问题的机构不少,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设在一些大学及政府部门的澳大利亚研究中心。比较突出的成果则有华东师范大学黄源深教授主编的“澳大利亚研究丛书”和南开大学殷汝祥教授主编的“澳大利亚研究丛书”,这两套书从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澳大利亚的情况,对国人了解澳大利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国内也有专门研究澳大利亚问题的刊物,即南开大学的《澳大利亚研究》(季刊,过去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资助,刊名是《大洋洲经济》)。

在译介澳大利亚及英美国家学者的有关澳大利亚政治经济的著作方面,国内学者同样作出了很大的努力。较早的译著如格林伍德所著的《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后来陆续翻译了一些澳大利亚著作如曼宁·克拉克的《澳大利亚简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75年)、《澳新内幕》、唐纳德·霍恩的《澳大利亚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等。政治人物的传记有鲍伯·霍克的《霍克自传》(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以及保罗·基廷的《牵手亚太——我的总理生涯》(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等。

但是,由我国学者就澳大利亚某一领域所撰写的研究专著则较少,而且多集中在历史领域,如《澳大利亚建国史》(骆介子,商务印书馆,1989年)和《澳洲史》(张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澳大利亚与亚洲关系史(1940—1995)》(张秋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其他最近的著作有《澳大利亚:在移植中再造》(王宇博,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澳大利亚文化史稿》(刘丽君等,汕头大学出版社,1998年)。

在中国,由于国际政治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发展相对较晚,同时国际关系的研究者对澳大利亚问题的重视程度不够,因此研究成果有限。而在有关本书所涉及的题目方面,国内的专门研究不仅量少,而且大多停留在表层的叙述和介绍上。首先,与澳大利亚对外政策直接相关的著作只有《澳大利亚外交史》(汪诗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和《澳大利亚东亚政策的演变——在碰撞和融合中实现国家利益》(刘樊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还有《美国的亚太同盟》(王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其中的部分章节对澳美同盟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评述。其次,是分析与评述澳美双边关系的文章十篇左右,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李辉的“‘9·11’事件后的澳美关系”、张建新的“寻求大国的庇护——太平洋战争期间澳美关系述评”(《史学集刊》1998年第4期)、“历史上的澳美关系”(《历史教学问题研究》1999年第1期)、宫少朋的“澳美安全合作的纠葛及其前景”(《美国研究》1992年第2期)和

胡宁的“澳美关系与亚太地区安全”(《当代亚太》2004年第1期)等。最后,与笔者研究问题直接相关的论文有汪诗明的博士后出站报告“论1951年《澳新美同盟条约》”,此报告论述了澳新美同盟条约的起源及影响;期刊文章有汪诗明的《澳大利亚参与伊拉克战争原因探析》(《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第40卷)、王帆的“试论澳新美同盟的历史演变”(《国际论坛》2005年3月第7卷第2期)、“澳大利亚出兵越南:原因、后果和教训”(《世界历史》1999年第1期),另外,专著有李凡的《冷战后的美国和澳大利亚同盟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但这些为数不多的期刊文章主要是就澳美关系发展的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或就某个特殊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评述,而未将澳大利亚的对美政策进行历史性的考察。

(二) 国外的研究状况

鉴于本人学术水平所限以及研究时间所限,试图对所有研究成果作出评述实在力所不及,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关于澳大利亚方面的材料是卷帙浩繁的。材料主要包括3个方面。

首先是关于澳美双边关系和澳美同盟的著作(共收集38本)和期刊文章(共包括50余篇)。

从总体上研究20世纪美澳关系的著作,有H. G. 盖尔伯的《澳美同盟关系——价值和意义》^①回顾了美澳同盟的形成过程,论述了同盟的利益在于阻止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扩张”,稳定东南亚。特雷弗·R. 里斯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三国关系纵览(1941—1968)》^②是较早一部全面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美澳关系的重要著作,主要运用了英国议会文件、官方出版物及当时的新闻评论等资料,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影响美澳关系的主要历史事件为线索,研究了1941年至1968年间的美澳关系。罗杰·贝尔的《不平等的同盟——美澳关系与太平洋战争》^③研究了太平洋战争期间及战后初期美澳同盟关系的形成和发展。格伦·J. 巴克利的《高层朋友:1945年以来的澳美关系》^④虽然利用美国、澳大利亚、

① H. G. Gelber, *The Australia-American Alliance: Cost and Benefits*,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1968.

② Trevor R. Reese, *Australia, New Zea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41-196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③ Roger J. Bell, *Unequal allies, Australia-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Pacific War*,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1977.

④ Glen St. J. Barclay, *Friends in High Places: Australian-american diplomatic relations since 194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新西兰的官方档案较少,但作者不仅仅考察澳美同盟关系的发展,也同样关注了英美关系、越南战争,这本著作拓宽了美澳关系的研究视角,对其后美澳关系的相关研究影响较大。T. B. 米勒的《战争与和平中的澳大利亚》^①将澳美关系作为重要内容进行了深入研究。E. M. 安德鲁的《从依附到独立澳大利亚外交政策史》^②主要研究从 19 世纪至当代的历史,利用相关的历史文件来解释历史事件。安德鲁认为,19 世纪澳大利亚外交依附于英国,进入 20 世纪后,历经第一次世界大战、大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直到现在,澳大利亚政府与英、美的关系发生变化,逐步从依附到独立,从紧密地依附到平等地结盟。安·科托伊斯和约翰·梅里特的《澳大利亚的第一次冷战》(悉尼,1984 年)^③介绍了澳大利亚在 1947—1953 年间的经济政策、奇夫利政府同苏联的关系及孟席斯政府卷入朝鲜战争等问题。

对笔者较有启发的是彼得·爱德华(Peter Edwards)的《永远的朋友?——澳美同盟的历史思考》^④。此文全面地回顾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至今的澳美同盟关系,在肯定了澳美同盟价值的同时,它也提到了澳大利亚所面临的安全困境。另一篇对笔者较为有启发的是保罗·迪伯(Paul Dibb)的《澳美同盟关系:澳大利亚的观点》。^⑤作为 20 世纪 80 年代对澳大利亚防务政策产生重要影响的《迪伯报告》的作者,他的文章系统分析了澳美两国在国内政治制度、价值观、历史方面的异同以及在亚太地区面临的挑战、机遇以及未来,给予读者澳美联盟关系的全貌。澳大利亚最为著名的澳美关系史学家诺曼·哈伯(Norman Harper)的《一个强大朋友:美国澳大利亚关系研究(1900—1975)》^⑥研究了 20 世纪初至 70 年代美国、澳大利亚国家关系发展的历史过程,并运用了大量当时最有影响的报刊、评论(如《每日电讯(Daily Telegraph)》、《悉尼先驱报(Sydney Morning Herald)》),用以探讨澳美防务合作的起源。该书的另一特色是研究了美澳由战时同盟关系发展到澳新美同盟条约的过程,提出了它们的同盟关系是否平等的问题。此外这本著作也关注了对

① T. B. Millar, *Australia in Peace and War: External Relations 1788 - 1977*,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78.

② E. M. Andrews, *A History of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 From Dependence to Independence*, Cheshire: Longman, 1977.

③ Curthoys Am, *Australia's first cold 1945 - 1953*, Sydney: Allen & Unwin, 1984.

④ Peter Edwards, *Permanent Friends?—Historical Reflections On the Australian-American Alliance*, Sydney: Longueville Media, 2005.

⑤ Paul Dibb, U. S. -Australia Alliance relations: An Australian view, *Strategic Forum*, August 2005, no. 216.

⑥ Norman Harper, *A Great and Powerful Friend: A Study of Australian American Relations between 1900 and 1975*,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1987.

日占领时期、印度尼西亚独立斗争时期及朝鲜、越南战争时期的美澳关系。

其次是关于澳大利亚军事史和军事合作(10本)的著作和文章(23篇)。杰弗里·格雷(Jeffrey Grey)的《澳大利亚军事史》^①从军事的角度记述了澳大利亚参加过的历次战争,诸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他的另一本著作《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和东南亚的斗争(1935—1972)》^②研究了澳大利亚在1948—1972年间卷入东南亚的历次斗争,这本著作还论及澳大利亚海军同美国海军的合作。H. S. 阿尔宾斯基的《澳美安全关系:从地区与国际的视角》^③梳理了澳美安全关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并且在地区和全球层面上论述其意义。

研究朝鲜战争时期澳美关系的最重要的著作是《澳大利亚在朝鲜战争(1950—1953)》^④,这部两卷本的著作是作者罗伯特·奥尼尔(Robert O'Neil)历时9年的研究成果,运用了大量的档案文献。第一卷从策略和外交方面研究了澳大利亚卷入朝鲜战争的历史,第二卷是军事史。奥尼尔认为朝鲜战争为外长斯彭德(Percy Claude Spender)实现其目标提供了机遇。

研究越南战争时期的澳美关系的著作主要有:彼得·爱德华(Peter Edwards)的《战争中的国家:澳大利亚在越南战争时期的政治、社会和外交(1965—1975)》^⑤,研究了越南战争时期的澳大利亚国内政治和外交,包括这一时期的澳美关系。彼得·金的(Peter King)《澳大利亚的越南: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中的澳大利亚》^⑥论述了澳大利亚参加越南战争的过程并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罗纳德·布鲁斯·弗兰克姆(Ronal Bruce Frankum)的《美国和澳大利亚在越南(1954—1968)》^⑦运用了大量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原始档案,探讨了澳大利亚卷入越南战争的原因,即实施澳大利亚的“前沿防御”战略。作者认为这一时期美国同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是一致的。

① Jeffrey Grey, *A Military History of Austral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② Jeffrey Grey, *Up to Top: The Royal Australian Navy and Southeast Asia conflicts 1935 - 1972*, Sydney: Allen & Unwin and Australian War Memorial, 1998.

③ Henry S. Albinski, *The Australian-American security relationship: a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St. Lucia,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1982.

④ Robert O'Neil, *Australia in the Korean War, 1950 - 1953*, vol. 1, vol. 2, Canberra: Australia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 1981 - 1985.

⑤ Peter Edwards, *A nation at war: Australia politics, society and diplomacy during the Vietnam War 1965 - 1975*, Allen & Unwin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Australian War Memorial, Sydney, 1977.

⑥ Peter King, *Australia's Vietnam: Australia in the second Indo-china war*, Sydney: Allen & Unwin, 1983.

⑦ Ronal Bruce Frankum, Jr., *The United States and Australia in Vietnam 1954 - 1968: Silent Partner*, NY: The Edwin Mellen Press, 2001.

研究伊拉克战争时期的澳美关系的著作有：罗伯特·盖文（Robert Garran）的《真实的笃信者：霍华德、布什与澳美同盟》，^①以伊拉克战争为背景深入分析了澳大利亚对美政策的各方面。罗伯特·曼因的《霍华德年代》^②一书也着力考察了伊拉克战争后澳美关系的深化。

再次是澳大利亚 50 年来政府公布的国防白皮书与军队改革的报告（15 篇），以及澳大利亚著名智库——罗伊（Lowy Institute）和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的研究报告（20 篇），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与国防研究中心的研究工作报告（working paper, 30 篇）。比较有借鉴意义的有由罗德·莱恩所撰写的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研究报告《不受束缚的同盟：新战略时代的澳大利亚与美国》，^③主要针对“9·11”以后的澳美同盟作出新的解读。澳大利亚国防部颁布的白皮书《澳大利亚的作战方式》^④从另一个侧面使我们认识到美国对于澳大利亚防务的重要性。

最后是关于澳大利亚政党政治和国家认同方面的著作（共 10 本）和文章（5 篇）。罗顿·戴尔李普（Rawdon Dalrymple）的《飘移的大陆：澳大利亚对地区认同的寻求》，^⑤从认同的角度解释了澳大利亚作为一个西方民主国家在亚太地区的认同困境。一种地理的错位，使澳大利亚产生了强烈的脆弱感，任何外界的不稳定都会激起澳大利亚强烈的反应以及不安全感。

此外，有关美国亚太地区政策史及澳大利亚外交史等相关研究也涉及了对美澳关系的研究。巴克利·罗杰（Buckley Roger）的《从 1945 年以后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美国》^⑥研究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同亚洲太平洋地区稳定而持久的关系。作者以冷战期间及冷战后的主要事件为线索，研究了美国的反应，从而证明美国是如何试图通过一系列的安全同盟及其自身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力量来维持它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统治地位”。对澳大利亚的论述散见于美国亚太同盟政策

① Robert Garran, *True believer: John Howard, George bush & the American Alliance*, Sydney: Allen & Unwin, 2004.

② Robert Manne, eds., *The Howard Years*, Melbourne: Black Inc. Agenda, 2004.

③ Rod Lyon, *Alliance Unleashed: Australia and the U. S. in a New Strategic Age*, Canberra: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2005.

④ *The Australian Approach to Warfare*, Department of Defenc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02 June, <http://www.defence.gov.au/publications/taatw.pdf>.

⑤ Rawdon Dalrymple, *Continental Drift: Australia's Search for a Regional Identity*, Aldershot, Hants, England; Burlington, VT: Ashgate, 2003.

⑥ Buckley Roger,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Asia-Pacific since 194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著作中。如巴瑞·鲁宾(Barry Rubin)和托马斯·肯尼(Thomas Keaney)编写的《变化世界中的美国同盟》^①对澳美联盟的现状和未来作出评价。

现有美澳关系的研究给了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但同时也让我们感到“意犹未尽”。一方面,从美国亚太战略的视角来考察澳美同盟关系的形成和发展,有助于揭示美国制订对澳大利亚政策过程中的意图和动机。但是,这些研究对澳大利亚对美政策涉及较少,因而对澳美同盟结成动因的分析就显得片面和单薄。另外一方面,现有的关于澳美同盟关系的研究基本上是围绕着某一具体时间段或者某一特殊领域进行,并没有充分展现澳大利亚对美国政策的变化,澳大利亚发挥的作用,从而没有动态和连贯地反映出澳大利亚对美国政策的制定与调整的过程。此外,现有研究在资料的发掘和论证方面也不够深入和具体,需要我们将澳大利亚对美国政策的研究融入到更加宏大的历史画卷中。

(三) 学术界围绕澳大利亚出兵参战问题上的争论

笔者的研究目的是通过对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2003年)的考察,通过澳大利亚参战的决策和在战争中的表现,对澳大利亚对美政策的特点作出分析和归纳。针对笔者研究的问题,虽然没有直接相关的著作,但是从对澳美同盟以及澳大利亚军事史的相关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对澳大利亚参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2003年)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观点是,应对共同威胁是澳大利亚跟随美国参加历次战争的根本,美国与澳大利亚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共同“反对共产主义威胁”到伊拉克战争(2003年)中的共同“制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反对恐怖主义威胁”。克里斯托弗·哈伯德在《澳大利亚与美国的军事合作》一书中表达了对澳大利亚参与美国军事干涉的看法,他强调半个世纪以来,澳大利亚与美国的关系随着两国在战场上肩并肩为对抗共同敌人的战斗而历久弥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再到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澳大利亚与美国的部队多次合作应对他们的“共同敌人”。从这个角度上说,就是他们的反对“共同敌人”的合作才赋予澳新美同盟以真正的意义。在面对充满危险的环境和致力于实现两国“共同目标”的努力中,两国的同盟关系得以长久维持,同盟关系的重要性得以彰显。^② 同样的观点体现在德莱克·

① Barry Rubin and Thomas Keaney, eds., *US Allies In a Changing World*, London: Frank Cass, 2001.

② Christopher Hubbard, *Australian and US Military Cooperation: Fighting Common Enemies*, Aldershot, Hants, England; Burlington, VT: Ashgate, 2005, p. 1.

麦克杜格和彼得·谢尔曼的《9·11以后的澳大利亚安全》一书中,“作为美国紧密的盟友,澳大利亚当然为‘反恐战争’所影响,尽管《澳新美条约》是一个比北约更加松散的条约,但是霍华德对美国的支持是源于恐怖主义的邪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对世界安全造成的威胁。霍华德政府的所作所为源于他们深存的信念,即布什政府的政策与行动是正确的”。^① 另外,应对“共产主义威胁”、“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造成的威胁”不仅是孟席斯政府,同样也是霍华德政府所宣称的澳大利亚追随美国参战的原因。

然而,笔者认为,“应对共同威胁”的观点并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在多大程度上,朝鲜的局势会影响到澳大利亚的安全以至于使其澳大利亚海、陆、空军倾其全力在朝鲜战场上积极部署和行动? 在多大程度上,萨达姆政权会威胁到澳大利亚的安全,甚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落入澳大利亚周边“失败国家”手中会对澳大利亚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以至于澳大利亚必须出兵参加美国的伊拉克战争? 这些都是值得质疑和反复思索的问题。

第二种观点是澳大利亚采取追随美国的政策是因为澳大利亚曾是英国的殖民地和自治领,是一个孤悬在太平洋上有着西方传统价值观念的国家。有人视它为“移植到南方这片辽阔大地的欧洲文明的一部分”。^② 由于其地处亚洲,使这样一个与欧美国家产生认同的国家在亚太地区显得格外脆弱,以至于急需一个欧美大国的保护以实现其安全。澳美两国是以欧洲移民为背景且主体民族同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后裔。两国都自认为是民主国家,说着同一种语言,有新闻言论自由以及对个人权利的强烈尊重等共同点。^③ 相同的社会制度在支持和推进共同的价值观念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使它们之间的结盟更具有有效性、统一性和持久性。

澳大利亚有着浓厚的西方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西方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深深地扎根于澳大利亚的外交土壤中。在冷战期间,美苏两级的对峙,澳大利亚认为这不仅是军事力量的较量,而且也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对抗。作为西方阵营的一员,澳大利亚自然奉行西方世界的标准。澳大利亚学者戴维德·沃克尔(David Walker)在《焦虑的国家》中表示:“澳大利亚作为一个远离欧美,人口稀少,有高度的城市化水平和西方价值观的大陆,当它日渐暴露在亚洲的面前,不得不受其影响

① Derek McDougall and Peter Shearman, *Australian Security After 9/11, New and Old Agendas*, Aldershot, Hants, England; Burlington, VT: Ashgate, 2006, p. 106.

② 唐纳德·霍恩:《澳大利亚人—幸运之邦的国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0页。

③ Joseph A. Camilleri, *The Australia, New Zealand, US Alliance-Regional Security in the Nuclear Age*,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7, p. 18.

时,其焦虑与担忧是值得理解的。”^①威纳·列维也持相同的观点,即“当澳大利亚这个孤单的大陆面临呼啸而来的‘国际共产主义’旋风,其对‘亚洲共产主义’将会席卷和掀翻澳大利亚国土的恐惧油然而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被亚洲国家侵略’的阴影再次笼罩在澳大利亚人的脑海”。^②面对一个陌生的亚洲时的无助,使其必须和共享西方文明的国家共同应对亚洲的共产主义。保罗·迪伯也认为:“澳美同盟分享共同的价值观和信念体系。澳大利亚和美国共享民主价值和理念,在漫长的历史中,两国曾经是亚太地区仅有的民主国家(包括新西兰在内),澳大利亚在20世纪,为维护两国共享的价值,与美国共同反抗法西斯与共产主义,在21世纪,与美国共同反对国际恐怖主义。”^③澳大利亚参加伊拉克战争,与其一贯奉行的西方价值观是一脉相承的。在美国大谈所谓的无赖国家、恐怖主义威胁之际,澳大利亚与美国一拍即合。在战前澳大利亚总理和外长的多次讲话中,他们屡屡强调澳大利亚与美国有着深厚的民主传统与愿望,有着共同的文化遗产和长期友好合作以及共患难的历史,并且把两国之间的军事同盟关系视为两国享有的共同价值观的实际体现。

但是,相似的认同和价值观在解释澳大利亚的对外政策上也存在着问题。正如澳大利亚前外长伊文思所说的“澳大利亚人和美国人因广泛的相似性而掩饰了双方制度和文化上的明显差异”。^④如果以澳美两国具有相似的价值观作为解释其出兵的原因,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澳大利亚为什么放弃英国转而投向美国,为什么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外长斯彭德强调:“只有与太平洋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建立正式的合作关系才能保卫澳大利亚的安全。”^⑤在越南战争时期,霍尔特总理也表示:“我不能理解在本地区澳大利亚除了从美国的友情和强力,还能从何处获取安全?英国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作为我国的盟友。很清楚,如果面临不测,我国的安全处于《澳新美条约》的保障之下。”^⑥其实,澳美同盟的建立反映了利益界定在同盟合作中是远远大于文化认同的。从传统上看,美澳之间文化的相似性要比美国的其他亚洲盟国更多,但澳大利亚与欧洲,尤其是英国的联系和融合则

① David Walker, *Anxious Nation*, St Lucia: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p. 231.

② Werner Levi, *Australia's Outlook on Asia*, Sydney: Angus and Robertson, p. 69.

③ Paul Dibb, *U. S. -Australia Alliance Relations: an Australian View*, Strategic Forum, August 2005, no. 216, p. 1.

④ Gareth Evans, Bruce Grant, *Australia'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World of the 1990s*, Melbourne: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303.

⑤ Current Note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1, no. 8, August 1950, p. 580.

⑥ Cabinet decision 60, 2 March 1966, CS file C4363 part 3, CRS A4940/1, AA.

比美国更多,因此文化意识的因素只能在一定情况下发挥作用,而本身不能成为第一前提。

建立在对现有观点“批判性地吸收”的基础之上,本书试图提出一种对澳大利亚对美政策的更好的解释。

三、研究理论与方法

(一) 概念的界定与理论工具

1. 相关概念的界定

澳大利亚追随美国参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的意图是什么、其追随行为特点何在、追随政策的效果如何? 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不能仅仅依靠所能获得的资料,同时也依赖于看待这些资料的“概念透镜”。只有厘清概念的内涵,才能建立起一座必需的平台,在此平台上进行学术研究和交流。所以,对本书会涉及的相关概念如“同盟(Alliance or Alignment)”、“追随(Bandwagoning)”、“国家实力与国家利益”等进行界定是必要的。下列名词为本书常用的专业用语,兹将关于该词语在本书中的用法简述如下。除非另有说明,以下述为准。

(1) “同盟”

“同盟”^①一词,在辞典中的含义比较宽泛,是国家为采取共同行动而结成的政治联合。《汉语大词典》中把同盟看作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为共同行动而订立盟约所结成的集团”。^②《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把同盟(Alliance)界定为“国际关系中不同强国或者国家进行联合行动的一个联盟,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对德国和它的盟国的美国 and 欧洲国家的同盟”。^③ 国际关系学者们使用的“同盟”一词,一般等同于军事同盟。本书在此仅介绍几种在学术界经常被引用比较有代表性的定义。阿诺德·沃尔弗斯认为:“‘同盟’表示两个或者多个主权国家之间所作出的关于相互间进行军事援助的承诺”,这种承诺与那种松散的合作协定不同,一旦签订包含这种承诺的军事协定,国家便正式许诺和其他国家一起与共同的敌人战斗。^④

① 汉语中与“同盟”同义的还有“联盟”一词,为行文统一,本书一概使用“同盟”一词。

② 《汉语大词典》第8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年版,第705页。

③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5th Edition, MICRO-PAEDIA vol. I: Ready Reference and Index, Published by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Inc.

④ Arnold Wolfers, “Alliance”, in David L. Sills(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McMillan, 1968, pp. 268 - 269.